

“财富必由勤苦而后得,得之必节俭而后丰”

——商书所呈现的明清时期市场经济

樊树志

兴起于晚明,盛行于清代的商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献资料,对于研究明清时代的经济、社会、文化,具有独一无二的价值。商书的种类繁多,一类是为初入商海者提供的了解市场与贸易的入门须知,如《生意世事初阶》《贸易须知》《生意经络》等,主要面向坐贾。另一类主要面向行商,为携带巨资往返于产地与市场的商人群体(亦即商帮),提示路程导引以及注意事项,如《天下水陆路程》《天下路程图引》《客商一览醒迷》《士商类要·路程图引》《示我周行》等。

法国年鉴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巨著《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把这400年的经济活动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涉及人们基本的物质生活,即衣食住行;第二个层次是市场经济,即生产与交换的机制,与农村劳动、摊贩、店铺、作坊、交易所、银行、市场相联系;第三个层次是资本主义——少数商人组成的垄断经济。为了对比西欧与中国,说明市场经济不一定导致资本主义,他还用大量篇幅描述中国的大米生产、城市生活和商业活动。他把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原因,归咎于国家的干涉与阻挠,并以中国商人在国外(例如南洋群岛)蓬勃地发展资本主义作为反证。

布罗代尔的观点得到不少学者的认同。美国学者彭慕兰在《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中文版序言中说,他很赞同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对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之间做出的区别:18世纪的清代中国肯定已经出现了“市场经济”,相对而言,当时的中国几乎没有出现“资本主义”。

黄仁宇在《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中总结他对于资本主义的研究时说:“在我们的时代,对这主题最有贡献的学者无疑是弗南德·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我特别欣赏他提出许多一针见血的总论,其中之一是‘资本主义只有和国家合而为一时才能成功,这时资本主义就等同于国家。’这句话就像锋利的刀刃,一举切开大部头的历史。”他在《万历十五年》自序中说:“我们也很难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在明代万历年间,中国的封建经济已向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一种系统。即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论述资本主义的流通方式,其公式亦为C-M-C,即商品(Commodity)交换为货币(Money),货币又再交换为商品,川流不息。但是货币是一种公众的制度,它把原来属于公众的权力授予私人。私人资本积累愈

◆ 反映清代江南地区盛景的《姑苏繁华图》(局部)



多,他操纵公众生活的权力也愈大。同时,商业资本又是工业资本的先驱,商业有了充分的发展,工业的发展才能同样地增进。这是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中国的传统政治既无此组织能力,也决不愿私人财富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为王朝的安全之累。”

我很赞成上述三位前辈的见解。明清时代没有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现在似乎已经成为学术界的普遍共识,至于有没有市场经济,恐怕还有不同意见吧。我认为,至少在晚明的江南已经有了相当规模的市场经济。李伯重在《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中说:“农村工业的发展更是引人注目,以至伊懋可(Mark Elvin)怀疑明清中国的农村是否已经‘过度工业化’和‘过度商业化’了。这些都使人相信明清中国(特别是在东部地区),也出现了早期工业化。”与这种早期工业化相适应的就是市场经济。

品牌与商标意识是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标志。松江府及其周边地区棉纺织业蓬勃发展,产品远销海内外,声誉鹊

起,逐渐形成若干优质品牌与商标。一些无良商人非法经营假冒品牌与商标,牟取暴利,这在明末清初已经成为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毫无疑问,这便是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产物。顺治十六年四月,松江知府在衙门口刻石立碑——《苏松两府为禁布牙假冒布号告示碑》,就牙行奸商(即所谓“奸牙”)沈青臣等假冒松江金三阳字号品牌一事做出裁决,在衙门口公示,“商贾贸易布匹,唯凭字号识认,以昭信义”,“金三阳字号历年已久,乃沈青臣勾同别商,射利假冒”,因此,宣布禁止这种“奸徒伎俩”,“自禁之后,各照本记号印刷贸易,不许仍前构造混冒”。由于松江优质棉布销路十分兴旺,奸商假冒活动禁而不止,康熙四十二年、乾隆元年重申禁令,说明假冒品牌商标之风愈演愈烈。显然,这是市场经济特有的现象。

张海英教授的新著《走向大众的“计然之术”——明清时期的商书研究》(中华书局,2019.5),从商书的角度向人们展示市场经济不为人知的另一面,让人们看到市场经济中商业文化的万花筒,令人眼花缭

乱,颠覆了先前对于商人与商业的固有偏见。

兴起于晚明、盛行于清代的商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献资料,对于研究明清时代的经济、社会、文化,具有独一无二的价值。商书的种类繁多,一类是为初入商海者提供的了解市场与贸易的入门须知,如《生意世事初阶》《贸易须知》《生意经络》等,主要面向坐贾。另一类主要面向行商,为携带巨资往返于产地与市场的商人群体(亦即商帮),提示路程导引以及注意事项,如《天下水陆路程》《天下路程图引》《客商一览醒迷》《士商类要·路程图引》《示我周行》等。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把商书研究的视角扩大到与商业有关的其他文献。一类是日用类书(亦即所谓“万宝全书”)中有关商业的部分,如《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一书中的“商旅门”“民用门”等,《新刻全补天下四民利用便观五车拔锦》中的“算法门”“体式门”等。另一类是有关商业的手抄本。足迹遍天下的徽商,经营典当、钱庄、布业、木业、盐业等各行各业,既有商业实践,又有文化修养,编撰了数量可观的

商书。这些商书大多没有刊刻出版,仅作为手抄本流传于世。书中记录了水陆路程、市场信息、买卖规则、行业规范、风土人情、经营技巧、商业道德等,其研究价值或许为正式出版物所不及。这一点已经由王振忠教授的系列研究所证实。

张海英教授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向深度和广度拓展,对所能搜集到的六十多种商书作整体性的研究,涉及商书出现与流布的社会背景,商书与商业政策、商业文化的关系,商书所反映的商业伦理与商人意识,商书所反映的市场经济与经商实践等等。对我而言,阅读这本书稿所获得的收获,也是多方面的。

商人群体的独立精神与主体意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愈来愈凸显,从一个侧面向人们昭示,历史已经跨入了一个新时代。诚如作者所说:“从明中叶开始,社会各阶层对商人和从事商业活动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士人们讲究实际,并不以‘谋利事功’为可耻。在徽州,人们更把商贾说成是徽州的